

本期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7月25日下午和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广元市、德阳市分别考察了翠云廊古蜀道、三星堆博物馆，了解当地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情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国运兴则文化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既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选择与变迁，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结果，是遵循深刻历史逻辑的必然结论。

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能历经千年而不衰，得益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明积淀，这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必然要选择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兼具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内涵和特质的超大城市，如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篇章？本期《理论周刊》约请专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紧密联系深入阐释。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

杨英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深入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文物保护、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发表重要讲话，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明确要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指明了方向。

生态兴则文明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要不断深化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在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时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嘱托，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古树名木提升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凸显“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认知。

美国两位学者保拉·朱利亚诺、内森·纳恩在2017年撰写的题为《理解文化的持续与变化》的论文中，研究了在进化人类学中出现的文化持久性的决定因素：不同世代生态环境的相似性。文章采用有关学者对500—1900年间全球网格单元的温度估计，以20年为一代计算平均温度，以70年平均温度的标准差作为环境不稳定性指标。通过确定近1300个种族的历史位置，匹配环境不稳定性指标，以现今近7000种语言使用分布情况与种族进行匹配。作者发现，在传统得到更大重视的地方，文化也会得到更持久地延续；祖先生活在跨代不稳定的环境中的人群，在今天对保持传统的重视程度较低，文化持久性也较低。

文化植根于人类社会，但其留存或激变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化本身的兼容性和应变性也决定了其是否能在激荡的环境中留存。上述论文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为我们理解现今的文明格局提供了新思路。

今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运城考察时，对黄河保护与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不能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要不断深化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守护好中华文脉民族根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

在三星堆遗址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他强调，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和文化传承。2002年4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他在序中

写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此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如果不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牢牢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个文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有更为厚重持久的文明润泽。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如果没有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没有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文脉，何来“第二个结合”？何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同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历史自信，进而必然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可资借鉴的路径与独特而光辉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历史上看，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我国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其所遇到的挑战之严峻复杂亦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

幸运的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同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历史自信，进而必然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可资借鉴的路径与独特而光辉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里的“万千气象”，不正寓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自信绽放、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荣耀辉煌吗？

中国式现代化，在为中华文明根脉、中华民族文脉开辟崭新发展空间的同时，其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共同面对未来难以预见的重大风险诸如地缘政治风险、气候风险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理解 and 实践依循，对于深刻认知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提供了更深层次和更高境界的价值维度。

（作者：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释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博物馆有很多宝贵文物甚至“国宝”，它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2023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运城博物馆考察时强调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组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成都如何开启连绵两千余年的繁华

孙华

成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得名至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那时的铜器铭文和文献记载中就已有“成都”一名。成都一带出现大型都市的时间更早，据考古材料，早在商代晚期，这里就形成了规模相当可观的都城和聚落群，形成了像成都西郊金沙遗址那样的都城规模城址。到了古蜀国开明王朝迁都成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更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从此开启了连绵两千余年的繁华。

成都的“城”

唐末在原成都城外的东、北两侧扩建罗城即外郭城，成都城继续向东南发展至古郫江（内江）与古检江（外江）的交会处，成都城的位置和范围从此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现代

成都很早就作为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乃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有其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的优势，也是区域文化和文明进程选择的结果。

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间，古蜀国的中心城市还是成都以北广汉的三星堆古城，但广汉的地理位置毕竟偏居成都平原北部，其地理区位还有不足。因而在公元前1100年后，古蜀国的都城就从广汉迁到了成都西郊，这就是位于成都老城西北约两三千米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年代紧接三星堆遗址之后，延续了大约两三百

年。如果金沙遗址是古蜀国的都城，那么成都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就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即便从开明五世迁都成都算起，成都的历史也超过了两千五百年，是全国少见的数千年位置不变、名称不改的省级都会和历史名城。

从金沙成为古蜀国都城开始，成都城市在三千年间，除了作为古代王朝的西南重镇外，还先后作为开明、蜀汉、成汉、前蜀、后蜀诸国的都城，成都城的位置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金沙遗址地处成都旧城西北，到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成都城，都城城址就沿着古郫江（内江）向东南移动至成都旧城的西南部；秦汉又在原开明王城东侧修筑大城，成都城的范围向东扩展至成都旧城中部；唐末在原成都城外的东、北两侧扩建罗城即外郭城，成都城继续向东南发展至古郫江（内江）与古检江（外江）的交会处，成都城的位置和范围从此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现代。成都城的城墙尽管已经基本无存，但环城护城河即今锦江还保存，内环路也基本就是原城墙的位置，成都的历史城市轮廓在已扩展了许多倍的现代城市中仍然非常清晰，可以辨识。

在成都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成都城市形态也发生较大变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三

个发展时期：第一期是商末至战国中期的古蜀国时期（约前1100—前316年）。这个时期的成都分为金沙和开明王城两个阶段，成都城市在后一阶段向东移到成都老城的西南部。这时期的成都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故可将这一时期简称为“未见城垣时期”。

第二期是战国晚期至唐代末期（前316—875年）。秦灭巴蜀后缩小了原先开明王城的范围，先在小城周围修筑城墙，以后又在小城的东侧修筑了大城，形成了成都大小城并列的城市形态，故可简称这一时期为“并列双城时期”。

第三期是唐末至民国时期（875—1950年），为了满足人口增多和城市防御的需求，高骈在原先的成都大城外新筑了一圈外城，成都城的格局从此变成了内外双城。在这以后，成都城的总体轮廓再也没有大的变动，主要变化一是明代在城中心修筑了正南北向的蜀王府，蜀王府城相当于先前内城（子城）的缩小版，成都两重城圈的格局依然保持；二是清代在城西修筑了不规则的满城，唐以前的“少城”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这一时期可称为“外郭内城时期”。

了解成都城的发展历程后，我们打开成都城的街区图来观察不难发现，在内环路范围的成都老城明显地可见三个不同格局的区块：一是唐末扩建区。旧城的东部和北部，呈现整齐的棋盘状街区，这是唐代末期扩建成都时按规划营建里坊的遗留，这在全国大城市中少见，值得关注；二是明初改建区，成都旧城中部正南北向的区域。蜀王府城平面呈纵长方形，有内外两道城垣，方向取正南北向，与成都旧城内其他区域完全不同；三是清朝改建区，成都旧城西南部为清康熙时期为安置驻防八旗军人及其家眷修筑的新城区——满城。满城城垣周长约四里多，城内以成都都节性的衙门为中心，中间以正南北向的大街为轴线，两侧按原先成都东西向的街道方向密布丁胡同。这些胡同现在仍然基本保存，是成都城的历史街区。著名的宽窄巷子就是其中的两条半（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

成都的“市”

参照古代成都季节性的商品交易市场，在三月的糖酒类之外再策划些主题商品交易博览会，并以古代成都的月市作为文化背景，有助于推进成都的商品贸易和服务业发展

由于成都城的历史格局保存较好，在制定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时，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成都旧城的中心即天府广场和科技馆以北，明清以前曾有相当大的湖泊摩河池，古代四川衙署宫殿就修建在摩河池岸边。以后湖面逐渐缩小，明代才填平摩河池建蜀王府。现在，古摩河池的部分以及池边考究的唐宋道路和建筑遗址已经发掘出来，附近还有明代

蜀王府的建筑和池渠。以古摩河池旁的古代遗址为中心建立遗址公园，使之成为成都城的传统文化中心、旅游游客中心和市民休憩中心，从而大幅提升成都的旅游品质。

成都平原在秦灭巴蜀之时就已有“陆海”和“天府”之称，成都城在汉代已经成为“五都”之一，包括蜀锦在内的蜀都工官的特种工艺制品销往全国，成都也有了“锦官城”和“锦城”之称。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唐宋时期的成都更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城市，唐末有天下城市“扬一益二”之说，益就是指益州治所成都。成都的手工业本来就发达，又是西南交通中心，秦蜀古道、川滇古道、岷江水道和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交会成都，更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成都一年四季都有集市。清代张澍在《蜀典》卷六引《成都古今记》说到十二“市”，即“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手工业，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现代的成都老城西南角还有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白酒老作坊“水井坊”，全国春季糖酒会于每年三月定期在成都举行。参照古代成都季节性的商品交易市场，在三月的糖酒类之外再策划些主题商品交易博览会，并以古代成都的月市作为文化背景，有助于推进成都的商品贸易和服务业发展。

古代成都游玩之风盛行。元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回忆旧时成都的繁华：“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这种大规模的游乐活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成都的主官要进行组织和维护秩序，并带头参加这些群众性活动。当时某些时节的游戏活动，连成都府署的花园都要向公众开放。在这些游乐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游山和游江。游山主要有两次，一是三月三日的游城北郊的游射山，二是三月二十一日

的游城东郊的海云山。游江也主要有两次，“小游江”是二月二日从南门万里桥放船，至合江亭处登岸；“大游江”则是四月十九日从城西南角的浣花溪登船，放舟至城南门万里桥上岸。现在，成都人仍然喜欢春节和元宵观灯，春暖花开和九九重阳时郊游观花，锦江游船也开始经营“夜游锦江”项目，恢复和发展古代成都每月两次的游玩活动，为成都旅游和休闲增添了新内容。

成都兼具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内涵和特质，文物古迹和当代街市交相辉映。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指出的那样：“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今天的成都，因继承传统和兼容并蓄而始终保持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古老的成都正以现代的精神迎来新的伟大时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